

余恕诚 著

唐诗风貌 (修订本)

中华书局



中国文学史

唐诗风貌

（第二卷）

——

余恕诚 著

唐诗风貌

(修订本)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风貌/余恕诚著. -修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2010.4
ISBN 978-7-101-07279-2

I. 唐… II. 余…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3444号

书 名	唐诗风貌(修订本)
著 者	余恕诚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年4月北京第1版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13½ 插页2 字数240千字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279-2
定 价	22.00元

序

我从未为人写过书序,这是第一篇而且极可能是唯一的一篇。按照请名人作序以增书的身价的传统风气和时尚,我自然不是作序的合适人选,但恕诚却执意要我来写。我想,这纯粹是一种纪念,一种对我们之间三十余年共事相知情谊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和恕诚相识于1963年。70年代中期以来,又长期合作进行李商隐诗文的整理研究,迄今已有二十余年。从80年代初开始,恕诚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向对唐诗风貌及其成因的潜心研究,有计划地撰写了十多篇很有分量和创见的系列论文,其中发表在《文学遗产》的就有六篇。这本《唐诗风貌》就是在上述论文基础上拓展、加深、提炼而成的专著。恕诚的每一篇论文,我差不多都是它的第一读者。在切磋讨论中不但学术上获益良多,而且更增进了对他人品、文品的了解与推服。书中不少章节,写在十多年前,但时至今日,当年初读恕诚文稿时那种先得我心的欣喜,那种新意突现对自己的启发,犹历历在目寓心。当“缘分”一词已经被用得近乎熟滥的时候,我倒觉得,我和恕诚之间三十余年合作共事的亲密情谊,确实是称得上有缘甚至投缘的。从这方面说,我又是当仁不让的为他的书作序的最合适的人选。

唐诗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大热门。千馀年来,著述如林,佳构间出。要想在这样一个领域作出成绩,必须绝去浮躁,在长期潜心研究中确有创获,并具有自己的特色。这本书对唐诗总体风貌及各个时期、各个重要诗人与诗派、各种体裁风貌的准确把握和细致辨析,固然很见功力,但著者的主要着眼点和用力处,却不只是对唐诗风貌的描述,而是对风貌成因的深入探讨。书中特别注意在诗歌风貌与社会生活之间,寻找中介,联系特定文化背景、诗人生活与创作心态,探讨某种诗歌风貌形成的基因,而且这种探讨,常能发人之所未发。比如初唐诗歌经历近一个世纪的缓慢演进方出现盛唐诗歌高潮的原因,前人与时贤已从多方面进行过分析探讨,仿佛已再难深入挖掘。本书第三章《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却揭示出关键的原因是在初唐思想文化背景下,诗人的性情还

未充分发展,因而纵使四杰、陈子昂已提出风骨兴寄并有所建设,但仍必须等到开元之世,从各方面为诗人性情的健康发展与高扬提供最佳思想文化土壤与气候,方能出现大潮涌起、群星灿烂的局面,这不但从创作主体心态个性的变化方面揭示出由初入盛的根本原因,而且实际上揭示了盛唐气象内涵的一个本质方面。又如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影响,建国以来许多有影响的论著,往往从一时一地着眼,过多强调它的负面影响,本书第七章则密切结合李、杜的创作历程,指出进入朝廷的高层政治体验对其政治心理的变化发展和诗歌创作所起的深刻长远的正面推动作用,并从此引发出“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结论。这对一个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中淡化政治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是一种纠正补偏。再如唐代边塞诗,过去多从所反映的内容及所采用的形式作一般的分析,本书第九章则注意到王昌龄、李白等人以一般征人口吻写出的边塞诗与岑参、高适等军幕文士所创作的以自我抒怀为主的边塞诗的不同,进而以此为切入点,揭示出军幕文士与代征人抒怀的诗人在生活体验和创作心理基因上的区别,并分析了两类边塞诗的各自的优长与不足。此章内容 80 年代中期以论文形式发表,对后来一些学者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的关系起过带动作用。中唐韩、白两大诗派,风貌殊异,如仅作一般描述或单纯从各自的艺术追求动机着眼分析其原因,都不免表面,“通俗诗—庸俗诗(软体诗)—硬体诗”的演进过程更属违反实际状况的臆想。本书第五章则从中唐进士集团内部不同政治、思想作风的两大类诗人入手,考察韩、白分别代表了通之于儒学政教的雄桀瑰伟与具有俊才达士的通脱自在的两种类型人物的不同思想经历与心态,从而揭示了两派诗歌风貌殊异的根源,并以此为坐标给整个中唐诗坛划出了主要分野。唐诗各种体制的风貌,本书第十一章有细致辨析,又在第十章中别立“叙情长篇”一节,集中讨论李、杜、韩等大诗人所创作的一大批以叙述为主要表现手段而旨在抒写丰富复杂、汪洋浩瀚的感情波澜的碧海掣鲸之作,不仅在唐诗分体风貌研究上是一种更细致深入的创辟,而且对这类长篇巨制出现的特定文化背景和诗人的创作心理动因也作了深刻的论述。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潮起潮落,从根本上看,是受民族精神变迁支配,诗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必须深入探寻各个时期的民族性情特征。这个基本观点,不仅体现于上举各章的专题分论中,而且集中体现在头两章带有总论性质的论述中。论唐诗对时代反映的深度、广度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特别注重有唐一代士人的精神风貌、胸襟气质。而对唐诗的整体刚健特质作追本溯

源之论,又特别注目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这一漫长的民族大融合过程所带来的胡汉诸民族精神文化的摩荡和融合及雄强之气的注入,从而对唐诗阳刚之美在气象、内质、情态方面的突出表现作出有力的说明。

恕诚为人,既恕而诚。他给人的突出印象也往往是其严谨谦逊、朴质淳厚的一面。但他的文章,却反映出其内在的灵秀和颖悟。书中经常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发的精辟新警之论和由具体论述生发升华的带普遍性的结论,更有许多对具体作品的深刻独到感悟和文采纷披的诗意表述,后一方面在本书的首章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我不敢自诩为恕诚学术上的真知音,但我相信,这本对唐诗风貌作文化学、文艺心理学阐释的专著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显示出它的独特价值。

刘学锴

1997年8月22日

弁 言

风貌一词,较早用于对人物的品评,^①与“体貌”意思相近。唐皎然《诗式》在论诗体(体貌)时,将它用在文学批评的文字中,^②意思也是指作品的体貌。皎然随后云:“风律外彰,体德内蕴。”讲诗体(体貌)的内外关系,同时也可以视为是从生成意义上对“风貌”的解释。今天,我们不妨把风貌理解为作品内在思想情感与外在艺术特征的综合表现。同时,不仅把风貌用于对具体作品的把握,亦扩展用于对作家流派、文体,乃至一个时代文学特征的认识与品评。

唐诗有不同于其他时代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唐诗内部不同阶段、不同诗体、不同作家或流派又各有其独特的风貌。本书将有重点地介绍唐诗有关方面的一些风貌特征,但不过多加以描述,而是努力在诗歌风貌与社会生活之间,探寻其中介,对社会的文化背景、时代心理、诗人的情感体验予以注意。重点结合唐代文学精神对形成有关风貌特征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以见唐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我们民族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具备的积极健康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唐诗艺术的文化学阐释,进而把对唐诗的审美,引向对唐代文化精神的吸收与借鉴。笔者自知这是一项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希望学者们在匡正本书的粗浅和错误的时候,把此项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①晋张华《博物志》卷六:“初(王)粲与族兄凯避地荆州依刘表。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谓曰:‘君才过人,而体貌躁,非女婿才。’凯有风貌,乃妻凯。”

②《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情性等字亦然。体有所长,故各功归一字。偏高偏逸之例,直于诗体篇目风貌,不妨一字之下,风律外彰,体德内蕴,如车之有毂,众辐归焉。”《诗式·取境》云:“成篇之后,观其气(一作风)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目 次

序	刘学锴 1
弁 言	1
第一章 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	1
一、唐诗对时代反映的广度与深度	1
二、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	5
第二章 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	18
一、地域	19
二、民族	22
三、唐诗刚健的特质	25
第三章 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	32
一、宫廷诗在初唐诗坛的地位	33
二、宫廷内外诗歌在发展中的互补	37
三、风骨离不开性情——初唐诗坛的期待	39
四、大潮涌起——伴随盛唐的各种社会条件对性情的催发	42
第四章 盛唐气象	48
一、盛唐诗歌风貌的主要特征	48
二、雄壮浑厚与感激怨怼	53
三、盛唐后期诗歌与前期诗歌在艺术风貌上的共同点	56
第五章 中唐韩白诗风的差异与进士集团的思想分野	59
一、中唐诗歌之变	59
二、科举、文学、政治的三位一体	63
三、韩诗——通之于儒学政教的雄桀瑰伟	65
四、白诗——俊才达士的通脱自在	71
五、以韩白为坐标看中唐诗坛的分野	76

第六章 晚唐绮艳诗歌与穷士诗歌	79
一、晚唐诗歌之变与诗人群体的划分	79
二、晚唐穷士诗人的歌唱	82
三、心灵世界与绮艳题材的开拓	88
第七章 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	99
一、唐前期的政治与李杜的理想	99
二、进入朝廷——大诗人的高层政治体验	102
三、后期——佗僚去国更不可没有政治的拨动	104
四、从给予创作的推动作用看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	110
第八章 唐代山水田园诗	115
一、唐代山水田园诗创作的社会生活基础	115
二、王孟韦柳山水田园诗的一般情况	116
三、王孟山水田园诗的风貌特征	121
第九章 唐代边塞诗	130
一、唐代边塞诗的一般情况	130
二、战士之歌和军幕文士之歌	133
第十章 唐代叙事诗与叙情长篇	145
一、叙事诗	145
二、叙情长篇	152
第十一章 几种主要诗体的艺术风貌	167
一、唐诗的分体	167
二、古体诗	169
三、近体诗	173
附录 文体交融与唐代诗文的变化革新	183
一、诗格之变与文格之变	183
二、中唐诗文互动的新形势与“以文为诗”	192
三、既是变局又是开局	200
参考文献	202
后 记	206

第一章 唐诗对时代的反映 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

诗史研究上的唐宋诗之争,尽管意见歧出,但唐诗以情韵胜,宋诗以意理胜,却已大致得到公认。^①又,明人何乔远可算宋诗派,但对唐诗亦非常推重,谓其“上自浑灏,下及鄙俚,一凡人情物态可以敷衍风雅者,无不点染”(《郑道圭诗序》)。文学接受过程中人们对一个时代诗歌的评价,实质上就是对这个时代诗歌风貌(总体或局部)的一种认识和把握。以上所引述的看法,在对唐宋诗的比较和品评中,揭示了唐诗一个方面的重要风貌特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与唐人在将丰富的生活体验化为精神产品时超胜于其他时代的诗美。对这一特征,本章将予以阐述。其中,唐诗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比较易见,尽量说得简略一些,而唐诗极富情韵,表现出特有的生活美和精神美,则打算介绍得细致一些。

一、唐诗对时代反映的广度与深度

“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其二)晚唐诗人李商隐曾这样高度评价李白和杜甫,认为他们的诗歌使天地人(三才)和宇宙万物的面貌都显现于诗中。李、杜固然是唐代诗人之首,其诗歌反映的范围包罗万象,而唐代在李、杜之外,尚有大批优秀诗人,他们都从一两个方面或多方面对其时代生活和周遭世界作了反映。五万首唐诗,其现实内容与题材之广前所未有,已得到了学界的公认。不过一般文学史类专书多注意于唐诗对社会诸方面实际生活和事物的反映,就事论事者多。本章则想在谈对实际生活反映的同时,兼及唐诗对唐人精神生活的反映。尽管精神生活归根结蒂是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但在介绍的时候,不妨把它稍稍离析出来,以便从一个侧面看得更为清楚

^①钱锺书《谈艺录·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唐诗以韵胜……宋诗以意胜。”

一些。

唐诗反映了唐人丰富的精神生活。从东汉末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统一以前,长期分裂动荡,中国境内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江南地区的开发,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的融合,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唐人精神文化展开在一个较之秦汉时期内涵要繁富得多的背景之上。唐帝国经济的繁荣,国力的上升,文化的昌盛,对儒释道三教以及各学派采取兼包并容的政策,这一切又使唐人的精神生活处在相对自由活跃的状态,可以多方面吸取,自由发展,因而唐人精神活动的天地是广阔的,精神生活内容空前丰富。

唐代是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时代。这个时代,特别是唐前期,主导面是积极向上的。唐诗反映了唐人重视事功、富有理想、胸怀开阔、热情豪迈的总体风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的事功精神;“济苍生,安黎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登高丘,望远海”、“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的广阔胸襟;“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豪气和热情,这些,作为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主调,在唐诗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唐诗具体地、细致地反映了唐代各种类型人物精神生活的各个侧面。李白式的对权贵的蔑视和傲岸;杜甫式的对国家和人民的忧念;王维、孟浩然式的希企隐逸、爱好自然;岑参、高适式的负气横行、向往边疆;乃至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那种旅食京华的辛酸;“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种游子恋母的心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那种告老回乡的感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种科场获胜后的狂态;“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那种新婚的羞涩;“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那种宫女失宠的哀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种苦恋;“心将流水同清净,身与浮云无是非”那种宗教情绪,无不一一呈露,情态毕肖。

唐代文人处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大部分来自庶族地主阶层,成员具有广泛性和流动性,形成了一个与前代很不相同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思想观念有许多新的特征。比如在出处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怀现实、参预政治的热情。“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语气很谦逊,但要效法稷契的用世之志却表现得非常坚决。在获取功名的途径上,耻于因人成事,以荫授官也不被人过分羡慕,而是普遍重视进士科的拚搏,甚至乐于到边疆和战场上去寻求出路。沈既济在《词科论序》中云:“开元之后,四海晏清,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全唐文》卷四七六)杜甫悼念严武时

说：“历职匪父任”（《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言其凭才能自可得官，不尽由门荫。武后时名相薛元超一生有三恨，而人仕“不以进士擢第”为首恨。可见唐人在出身方面的企羨由门第转向进士。至于“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其五），则更见唐人在文与武的抉择中对武的企羨。在知和行的关系方面，唐人重视实际知识，重视经世致用。李白嘲笑鲁儒：“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鲁儒》）可以说无论是汉代的经学，还是魏晋玄学，都被唐人丢开了，而代之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项更为有用的真本领和实际行动。此外，在伦理观、君臣观、门第观、尊卑观、妇女观、民族观、宗教观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较其他时代开放。^① 唐诗在有关题材中往往不自觉地反映出观念的变革，后世读者从唐诗中总是突出地感到唐人的思想空前活跃。

唐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唐人的言行较少伪饰和拘束。一些在后代人那里羞于自我暴露的话，他们能够坦率而勇敢地写进诗里。如杜甫交待他在京城里干谒乞求的情形：“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又以他所享受的特权和平民对比：“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李白得到玄宗召他进京的诏命时，在诗中毫不掩饰自己的狂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宋人批评他浅薄。虽或许有其浅，但绝不伪饰。元稹写他对其恋人始乱终弃，白居易写他老来放走歌女时，如何勉强无奈。韩愈说跟孟郊相比，自己奸黠而善于混世。又在《符读书城南》中为勉励其子用功时说：“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元、白、韩愈的这些行为动机并不高尚，后人时有讥议，但值得注意的是元、白、韩愈很坦然地把他们的所行所想写进诗里。“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李白《独漉篇》）。唐人无论对人对

^① 伦理观：如柳宗元《六逆论》针对传统以为逆的“贱妨贵，远间亲，新闻旧”进行批驳。杜佑将妾扶为正室，受诰封，在时人眼里仍然是德高望重的大臣。君臣观：如李白向往比较平等的君臣关系。杜甫对他“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行为表示欣赏。尊卑观：如李白云：“钟鼓饔玉不足贵”、“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妇女观：唐代对妇女限制相对放松，武则天以女主临朝，革唐命，在其他朝代殆不可思议。唐代公主改嫁，即使多次，史书均不隐讳，可见礼俗上在这方面是不大限制的。民族观：唐民族界限观念淡薄，不大强调华夷之辨。唐初史家修南北朝史时，对南北基本上一视同仁。宋人范祖禹对唐代皇帝给少数民族的功臣赐“李”姓则不能容忍。宗教观：不仅朝廷对儒佛道三教兼包并容，唐代文人也往往同时采纳好几种宗教思想，陈陶自称“三教布衣”，白居易宣称“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遇物感兴因示子弟》）、“外服儒风，内宗梵行”（《和梦游春序》）。

己都比较爱讲真话,并不多戴面具。因此,唐诗把唐人精神领域里的正与反、是与非、利与害、廉与贪、进与退、出世与入世、勇敢与怯懦、庄严与滑稽、崇高与卑下,都一一展示出来,这使唐诗对于时代精神生活的体现更为深刻丰富。

唐诗反映了唐代丰富的社会生活。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诗为主,从主导方面看,它是主体情感的表现,而不是对周遭世界的再现。唐诗的抒情性不比前代弱,对现实的反映也大大加强了。唐人热爱生活,重视事功,对现实社会生活特别关注。他们的绝大多数诗篇,不是吟玩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而是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感受和评价,因而通过抒情,自能把读者带进他们感情所拥抱的世界。另外,写法上,唐人不仅在乐府诗中发扬了反映时事、反映现实的传统,而且在五古和七古中加强了叙述的因素,注意叙事和抒情的结合,也大大地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性和社会性,从《全唐诗》可以看出,它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所反映。唐诗的触角伸展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陆海山川、村落城镇、驿楼寺观、士农工商、僧道妇孺,还是社会各阶层、南北各民族的生活、重大的现实政治斗争、历史题材,无不加以描写,在诗歌这样一种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反映这么广阔的社会生活,不仅前所未有的,亦且后所未见。也许我们很难轻而易举地拿《全唐诗》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诗》等进行比较,但不妨就一些断代的诗歌选本加以对照,那将会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唐诗对社会生活反映的深度和广度在其他时代之上。像安史之乱那样在规模和范围上可以与之相比甚至超过它的历史事件,在许多朝代都曾发生过,但迄今中国诗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当年反映安史之乱那样,留下那么多名篇。

唐诗反映时代生活所以特别深广,与诗人们积极地干预当时社会生活有关。许多诗歌触及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种种重大社会矛盾,诸如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穷奢极侈、拒谏饰非、黜贤用奸,以及农民、手工业者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这些诗篇不仅数量多,而且比前代作品具有更大的批判力量。宋人洪迈云:“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其他波及者……不能悉书。……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元日仗》……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容斋随笔·续笔》卷二)“直辞咏寄,略

无避隐”，当然说得绝对了一点，但唐代诗人敢于谴责权臣贵戚、抨击封建制度的腐朽，有时甚至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却是事实。一些进步诗人既敢于大胆揭露，又善于细心观察，深入解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惊心动魄的名句，至少在客观上反映了封建社会阶级剥削、阶级对立的本质。

唐诗反映社会生活面之广与反映时代主旋律是统一在一起的。宋人继唐之后，在唐人已有的题材之外，还有不少扩展。“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缪钺《论宋诗》）宋人吟咏的范围的确相当广阔，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开拓，应予以肯定。但“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的另一面，是往往把社会历史、人民生活中的一些大事忽略了或有意避开了。北宋出了不少优秀诗人，但对时代生活主旋律的反映远不如唐诗突出。“唐诗的时代感越鲜明，他的生活气息也就越浓厚。”（林庚《从唐诗的特色谈起》）同样都可以说是面向生活，宋代诗人在对书卷的把玩、在亭园客堂、在文人起居饮食、日常琐事方面花费的笔墨似乎太多，而唐诗则更多地面向整个社会。时事、政治、边疆、市井、民间的欢乐与痛苦、征夫思妇的哀怨与忧伤是唐诗最习见的题材，因此唐诗可以说是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时代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也就非常敏感地反映着时代的主旋律。

二、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唐诗反映时代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其中固然已经可以见出唐诗的非凡成就，但唐诗的魅力历久不衰，而且越过语言障碍走出汉语世界，走向东亚，走向西欧、北美，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则不仅由于它的巨大认识意义，同时还在于它在反映中国七至九世纪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时，带有独特的“丰神情韵”，充分地表现了唐人的生活理想与精神追求，具有丰富的生活美与精神美。对此，本节将详细地予以介绍分析。

文艺表现人们生活美和精神美的问题，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上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的。本节之所以就唐诗着重加以讨论，是因为唐诗以前所未有的艺术力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在它繁荣昌盛期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美，也表现了这样一个时代中人们比较健康昂扬的精神状态。尽管唐代社会本身也有走下坡路的时候，有如杜甫所讲的“万方多难”的时代。但由于这种时代是紧接在“一百

四十年,国容何赫然”(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六)的盛世之后的,盛唐的精神文化影响仍然极为深刻,人们的胸襟气质还是跟其他时代不同,还有幻想、有希望,甚至觉得盛世还会再来。这时候,生活在人们的感受里即使是惨淡的,也还能够有力地拨动人们的心弦,使人们为之激动、为之歌唱,而一般不致对它麻木不仁。因而,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美和精神美显得更加元气淋漓。在这方面,至今还是不可企及的范本,还能继续给我们美的享受,鼓舞人们积极地、正确地对待生活,同时从艺术的角度能给我们今天的创作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代那样一个兴旺发达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很容易激起人们的诗情,而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诗人又往往更多地带着一种诗意的眼光看生活,因而即使是在平常的、习见的生活中也发现了丰富多彩的美。但处在经济高涨中的唐人生活,在诗中一般地并不表现为平静、小康和满足。即使是日常的和平环境中的生活,在诗人的笔下,也往往显得浪漫而开展。人们的精神、情思,不是像秋水般的沉静,而是像春水般的不安于平地,寻找浩瀚的海洋。在那春潮般涨满的生活江面上,烟云缭绕,浮动着一种热烈的情绪,一股深情的期待和展望。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表现的就是人们在和平岁月里的生活感受和情思。诗中带有一点惆怅和迷惘,但这种情绪不同于“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一类沉重的叹息,它不是反映为生活的苦难,或者枯燥、贫瘠,而是产生在对生活、对自然如梦如痴的陶醉和进一步追求的基础上。现代作家朱自清的名作《荷塘月色》也曾描绘过一个美好的月夜,但它让人感觉全局是压抑的,只有那很小的一点空间和时间是自由的。而《春江花月夜》从自然境界到人的内心世界都不受任何局限和压抑,向外无限扩展开去。人们面对着浩渺的春江、海潮,面对着无边的月色、广阔的宇宙,萦绕着绵长不尽的情思,荡漾着对未来生活的柔情召唤。人们的思索、追求、期待、召唤,表面上是由春天的良辰美景惹起,被春天的旋律催动,似乎跟具体的物质因素距离比较远,实际上却是那个健康发展的时代生活带来的,是时代生活的美的折光。王维的《春中田园作》也取材于和平环境中的日常生活,诗中写新春欣欣向荣的景象,写人和生物愉快地迎接春天。在这种背景下,诗人“惆怅思远客”,感慨世间还有人不能享受生活之美。这与《春江花月夜》的追求,本质上是一致的,乃是希望生活更圆满、更理想、更无缺憾。诗中“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两句,反映生活在自然地、和平地更替与前进。丝毫没有叹息流年的情绪,而是在新的时间内容面前,在旧有的基础上,憧憬美好的明天。

《春江花月夜》和《春中田园作》所表现的对于生活的感受,还包含着自然

所给予人们的美感。这种感受,和生活中的其他因素是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的。“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反映了在唐人心理上,自然和人已经以近乎对偶的关系结合了起来。人们觉得在自然身上发现了美,也就等于在自己生活中发现了美。王维的《辋川集》写自然景物,同时也就是抒发对辋川生活的感受。王湾的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次北固山下》),面对自然景色,不仅油然而生起春日 and 黎明到来的愉悦感,甚至还感受到了某种时代春天的消息。自然景物和生活感受的诗意的结合,是唐代山水诗的突出特点。许多诗人,正是把自然美作为生活中一种美好因素加以表现的。

日常的送行和离别题材也被进一步诗化了。唐人赠别诗极多佳什。“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他们并不一味抒写离别之苦,而多将送别时的环境美和情意美有机融合,构成富有诗意的离别。“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送沈子福归江东》),十四个字同时包含着这两方面的因素。李白《金陵酒肆留别》依依惜别中融合着愉悦感,柳花飞絮,酒肆飘香,劝酒的吴姬,相送的金陵子弟,“欲行不行各尽觞”的送别场面,可与江水比长短的别情别意,几种因素汇合在一起,像把别离酿成一杯醉人的美酒,引起人们对盛唐时期生活风调的无限遐想。王维的《相思》,写的是别后的思念,情和物都优美动人。“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红中带黑,晶莹鲜艳,色调是寂寞沉静中带着热情和希望,确实可作为思念之情的象征。多采红豆,即表明思念之深。渴望对方不断采摘,把他的思念化为一粒粒珍珠般的红豆,就显得这种思念更富有诗意。

因为是那样一个比较单纯、健康的社会,从日常社交关系中,也常常表现出一片淳朴的情谊。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寓深挚的友情于极为淳淡的色调和气氛之中。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一方面写出绿蚁新酒、红泥火炉和黄昏欲雪;一方面写出渴望与刘十九把酒共饮的深情期待。生活中这种物质性因素和精神性因素相结合,显得特别令人心醉和神往。

对于生活的歌颂,爱情是一个重要的领域。爱情生活反映在唐诗里,有着更加鲜艳的色彩、更加炽热的情感。六朝民歌《杨叛儿》:“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到李白笔下发展为八句:“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后者显然更带唐代浪漫生活气息。它一开头就出现了唱歌劝酒的场面,中间明确写出醉留,最后两个七言长句用双烟升腾作比喻,把